

# 中大台大與我

戴運軌

## 前 言

歲月不居，彈指算來，我今年已屆七十三歲了。在行將退休的前夕，回首前塵，緬懷往事，覺得個人在以往的七十三年裏，有幾件事是聊可傲帶自珍的。例如，自我邁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校門，除了進行本位的研究工作以外，我始終站在教育工作者的崗位。從北伐到抗戰，到戡亂，到中興基地寶島台灣。其次，如我曾以多年的時間，用最大的心力，從事電磁理論，X射線結晶分析術，以及航空風洞的研究。繼而進行原子物理及原子核實驗，頗有收獲。其間對國立台灣大學之接收與建樹曾竭盡棉薄。最後，便是我和國立中央大學的歷史淵源，甚至我可以說：那是一段美好的，艱苦的，忍耐創建的，永留我心底記憶深處，結不解之緣。

早在民國十七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，當年的四億五千萬同胞，掙脫了軍閥的壓榨桎梏，回到南方去，成爲在北方人士一致的熱烈嚮往。當時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任教的我

，自然也不例外。同時，我更獲得了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，膺東南最高學府——國立中央大學張乃燕校長之聘，前往該校擔任物理學教授。中央大學設在首都南京，古來所謂龍蟠虎踞之地，不僅爲人文薈萃之所，而且離我的故鄉——浙江奉化也不在遠。因此，時至如今，我仍不能忘懷當年欣然載道，整裝南下時的歡欣鼓舞之情。

國立中央大學自南高時代擁有悠久的光榮歷史，優良的傳統。此一傳統亦即中大儘量保持，使能相沿成習，蔚然大觀的校風，可以說是全校師生精神修養的指標，實現理想的動力。四十五年以前我到中大任教，旋即發現中大的校訓：「誠樸」二字，正是傳統校風的具體內涵。四十五年以來，我曾一再的諄諄告誡同學們說：

「語云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以此求知，何患不成？」

我又嘗說：

「惟其樸實無華，方能刻苦用功。」

我用以上的兩種說法自我鞭策，同時也勗勉

中大的同仁和同學。由於中大學風和校訓所給予

我的啓示，使我深切的感到：中華五千年文化所孕育的精神文明，正是促使我們文化大國得以屹立於世的主要力量，而我們也必須發揚這種優良的傳統精神，全體師生一致堅苦卓絕，篤學力行，才能够使國家有前途，個人有出路，不致像若干物質文明發達的國家一樣，因爲青年感覺精神生活空虛，因而徬徨歧途，學潮迭起，學生無法安心讀書，教授們亦唯有徒呼負負。

自北平南下，赴中大任教後我即曾向同學們提出：「心無旁騖，戮力向學，戒除浮華，崇德修身」的要求。同時這些許要求也形成了我個人言行的規範，處世的準繩。因此中大誠樸的校風與校訓，差可與我合而爲一，凝成一體，使我益發感到中大和我亦不可分了。然而，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，當我在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當了四年教授以後，我竟會因友好的不斷敦促，無從推却，遂而在民國二十一年辭卸了中大的教職，轉赴私立金陵大學任教。自此一別，便與中央大學睽離了整整三十年。

令我更無從想像的是：三十年後，職責艱鉅



國合聯在，議會平和能子原席出（任主系理物大台任時人二第右者立）者作文本  
。談晤表代朗伊與（人一第右）士博謀熙李偕，上廳議會大

，任重道遠，荆棘遍地，阻力重重的中大在台復校工作，竟會臨到了我的頭上。

在金陵大學教了一段時期的物理學系，七七事變，抗戰軍興，我追隨中央政府西遷，自南京溯江西上，先武漢，後重慶。沒有想到這一場中日大戰，一打就是八年，這其間我除了繼續擔任教職，還本着學人報國之旨，響應政府的號召，在物資和器材極其匱乏的情形之下，胼手胝足，歷盡艱辛，為國家從事X射線和航空風洞的研究。因此，曾有很長的一段時期，我住在風物無殊江南的四川省會——蓉城成都，尤其住在華西後壩，講學借華西大學赫斐院，前後歷八年之久。

### 協助接收台灣大學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。國土重光，舉國軍民歡欣若狂。但是由於我擔任畢業班四年級功課及畢業論文指導，不能于當年十月動身來台。其間把功課委託劉朝陽先生（華西大學教授）代理授課。我始能脫身，直到半年以後方能東飛。那是在民國三十五年二月，教育當局朱駱公界予我一項重要的任務，自成都飛赴台灣台北，這一處自甲午戰後淪於日本達五十一年之久的美麗寶島，協助接收台北帝大。我們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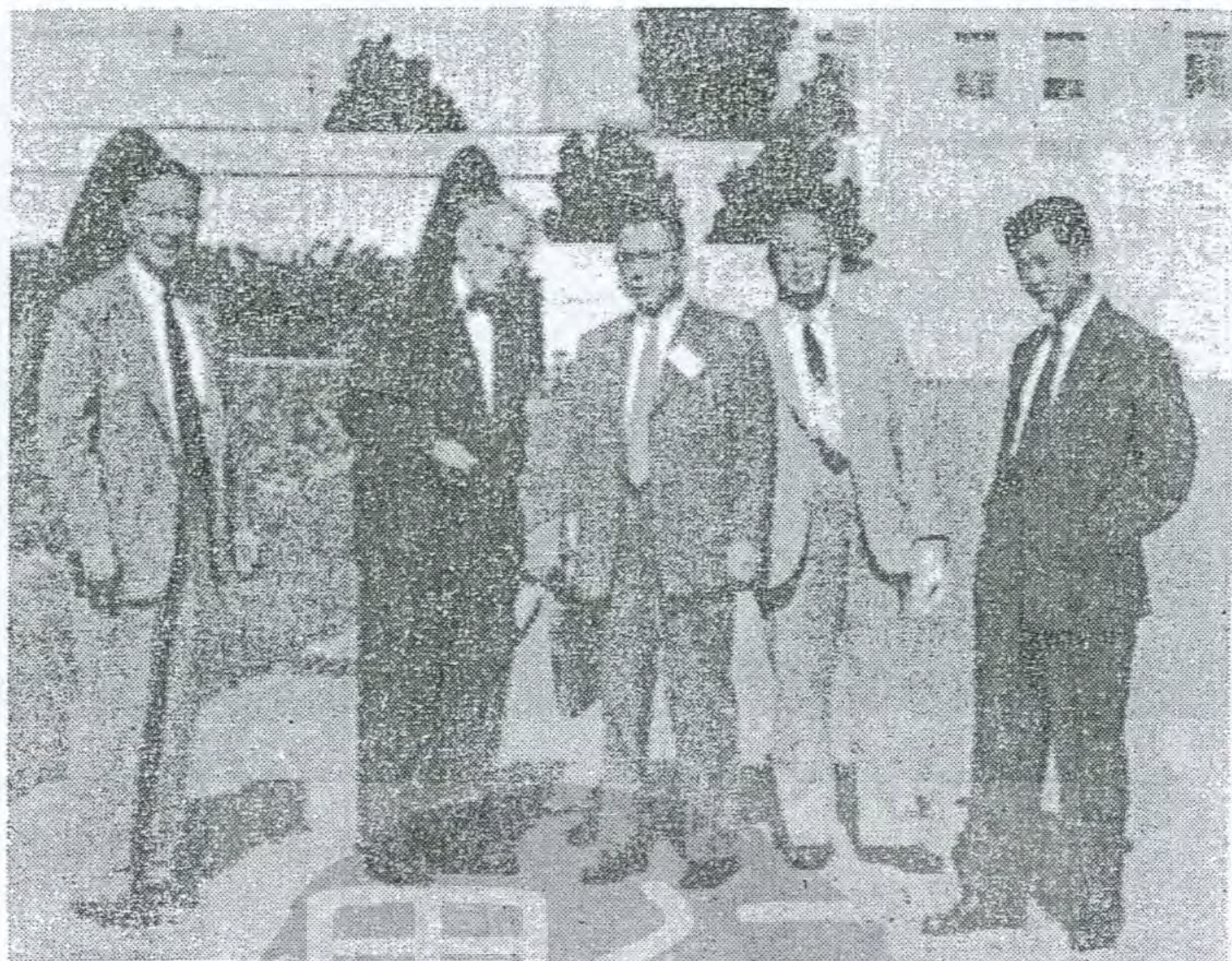
那個國家民族恥辱的標記抹去，將日本人的台北帝大一改而為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立台灣大學。接收工作順利完成，我膺聘擔任台灣大學物理學教授，兼系主任，再兼教務長，並兼理校務。但其間艱苦備嘗，決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教務處為日本大學所未見，樣樣從頭做起，「學則」即其中之一例。兼任台大教務長職務，前後共歷兩年，後來方始辭卸。就在這兩年裏面，我曾在台大物理系建設了二十四萬伏特的直流高壓電源，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原子核研究室。在當時物質條件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，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為我的構想可以成為事實。但是我和台大物理系的師生們，仍然排除萬難，不屈不撓的使它終底於成。直到現在我還很清晰的記得，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，當我們成功的完成了第一次原子核（鐳核）擊破實驗，我們全體師生所表現的歡欣與愉悅。祇不過成功並沒有帶給我們滿足，奇跡顯現亦未能使我們止步。我們持續不斷的埋首努力。勇猛精進，更進一步的加速製造重水，用以產生重氫和中子源，再將人工放射試驗付諸實現。這是台灣從事原子物理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，自三十五年算到五十一年，為時已歷十七年之久。

大陸淪陷，樞府遷來台灣，中央大學的校友們，來台者相當的多。當民國四十五年，俞鴻鈞先生出任行政院院長，中大老教授張曉峯（其昶）先生出長教育部。他正以雄渾的氣魄，大刀闊斧的手法，在積極建設教育事業。全國各知名學府在台復校者，一時有如雨後春筍，方興未艾之

勢。國立中央大學自然也不例外，因此，在民國四十五年初，即已有中大在台復校的倡議。身為中大老校友之一，我對於這一類令人鼓舞的消息

是格外關心，十分注意的。祇是自四十五年初以迄四十七年春，依然是只聽樓梯響，不見人下來。



民國四十四年本文作者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前所攝，圖中左起：魏學仁、法國出席原子能和平會議代表，吳靜、本文作者暨陳錫林秘書。

民國四十七年恰值國際地球物理年。所謂地球物理，那是一門關係國計民生甚鉅的新興科學，也可以說是一種劃時代的貢獻，簡而言之，就是揚棄過去以地質方法研究地殼。而改用嶄新的物理方法，來研究地球內部的構造，以及陸、海、空三界。

當時我們國內並沒有地球物理研究所，但為迎合潮流，趕上時代，事實上是非得設立不可的。因此，國立中央大學正在為復校工作努力奔走的校友們，首由張曉峯部長指出，便毅然決然的挑起了這一副重擔，再度向有關當局呈請恢復中大，讓中大走在時代的尖端，羣策羣力，攜手合作，先把地球物理研究所設立起來。

很幸運的，便在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三日，俞鴻鈞內閣舉行最後一次院會，方始將中大校友的呈請，予以原則上的通過。

但是從「原則通過」到計劃付諸實現，中間却歷時整整四年，而且還迭經艱辛，難關重重。

先是，在民國五十年元月，教育部設置了一個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，由當時任教育部部長的梅月涵（貽琦）先生兼任主任委員，聘請凌鴻勳先生和我等委員計共十位。我記得在第一次開籌備會的時候，就曾有一位委員質然的問道：「地球物理究竟是什麼呀？」

### 第一個地球物理研究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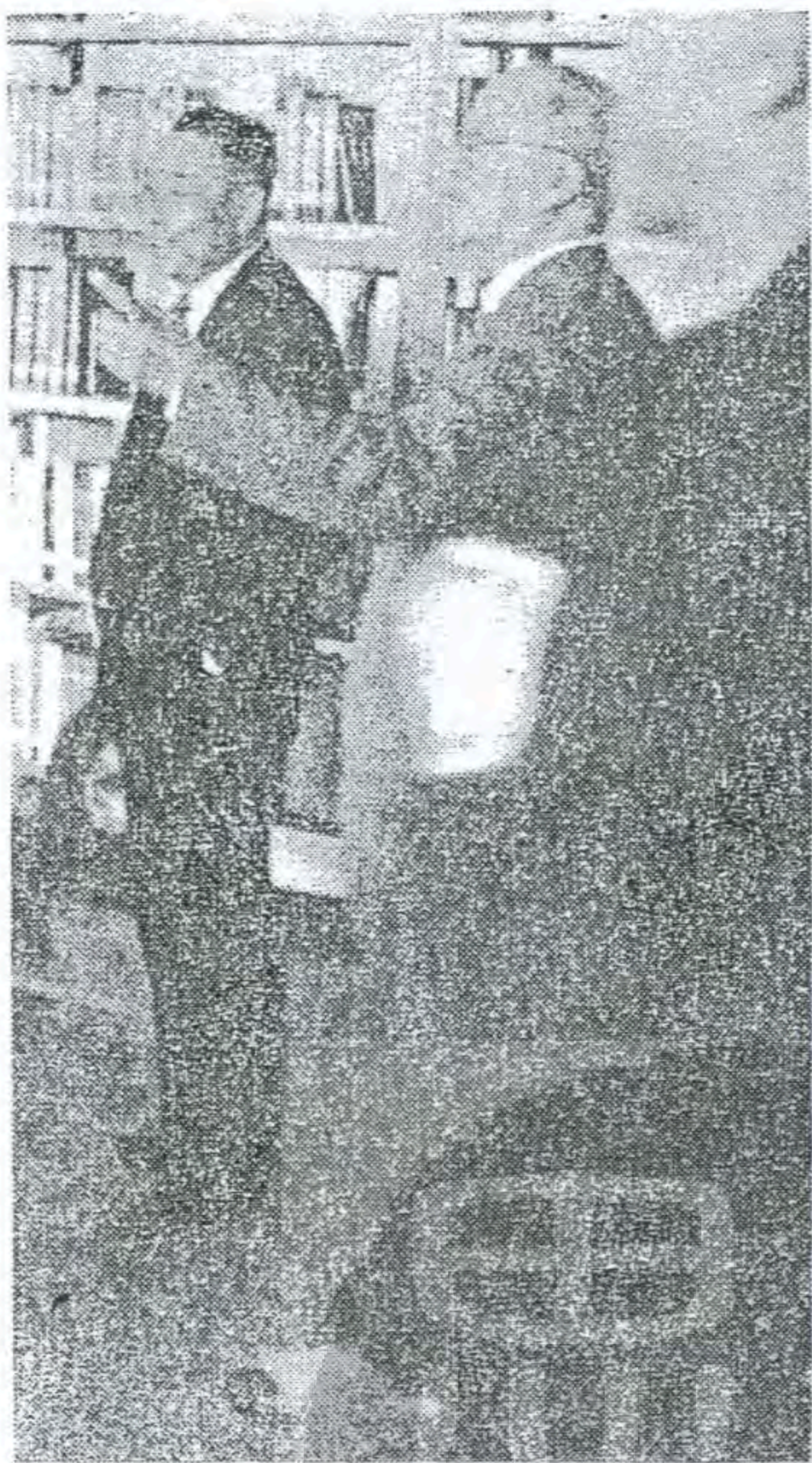
經我加以解說後，居然又有另一位委員先生發表了他的高見說：

「我看研究地球不妨從地質學開始，因為地質學的師資畢竟多些，不像地球物理學的師資，是如此的缺乏。」

我當時頗感為難，祇好這樣婉轉的回答他說：「以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名義，來辦地質研究，顧名思義，似有未妥。況且國內已經有了兩個研究地質的機構，諸如歷史悠久的台灣省立地質調查所，以及師資、設備都很好的台大地質研究所……目前地球物理師資誠然缺乏，但如方針正確，鏗而不捨，一面逐漸聘請專家學者，一面多方自行培植。我想在幾年以後，這個問題自會迎刃而解。」

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後，主任委員一職前後曾有四度更易。起先是由教育部次長浦薛鳳，代理梅部長的這一個兼職。繼而梅月涵先生病逝，黃季陸先生出長教育部，主委亦改由黃部長兼充。其後則由中大老校友，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先生主其事。

記得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中旬的一個炎炎夏日，黃季陸部長駕臨舍下，給我帶來了憂懼的消息。他說教育部業已決定成立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，希望我能擔任所長一職。我為中大復校初步告成，喜不自勝，但却又為自己的年邁事鉅，不堪負荷而憂思忡忡。但黃部長一再勸駕，我不得已向黃部長說明了我的苦衷，我告訴黃部長，從民國五十一年夏到五十二年夏，我雖在台大物理系有一年的休假，可是美國奧克拉荷瑪，和香港兩地早已一再的邀我前往講學，藉講學而旅遊休憩，與乎開闢草萊，設立新興研究所，對一個老年人來說，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，黃部長對於我的苦衷頗表諒解，祇是他一再強調斯職非我莫屬。他再三敦促，使我固辭不獲。迫不得已，我



民國五十年，現行政院蔣院長，視察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，本文作者載運軌教授（中）在旁說明。

祇好勉強同意暫且以一年為期，就如像當年我協助清華大學創設原子科學研究所一般。不曾想到，我這一點頭，勉力一試，竟會試了十二年，直到我以七十三歲之年，行將自教育界退休為止。而且，中大復校這一件大事，也從一個地球物理研究所擴展到大學部的八個學系，以其分別成立的次序而言，則為民國五十七年五月，物理學系及大氣物理系。五十八年：化工系、中文系、數學系。五十九年：外文系。六十年：土木系。六十二年將物理學系一剖為二，改設為物理學與地球物理學兩個學系。

以創辦地球物理研究所為例，我於五十一年七月中旬接受教育部的任命，為中大復校奠基。八月四日，我們便正式招生開學。乍看起來，這似乎是奇跡。但若究

其因，無非教育當局的熱心支援，與同事友好的鼎力相助。誠然，當黃部長邀我擔任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的時

候，研究所的大樓尚在苗栗的二平山上設計與築之中，距離竣工日期，為時尚遠。而新學年度即將開始，我唯恐等候新樓竣工，一拖又是一年。祇好向時任台灣大學校長兼中大籌備委員的錢思亮先生商洽，

請他暫予借用籌備地點。錢校長慨然撥借台大物理館二樓的房間，我便找了兩三位辦事人員，開始了籌備工作，連延攬教授到擬訂課程，都能在極短促的時間之內及時完成。而要等到苗栗二平山上大樓完工全所師生遷入，則已在一年以後了。

從一個研究所擴充到整個大學部，自佔地不到五甲的苗栗校址，擴展到達面積五十餘甲的中壢校舍，中大建校搬遷的艱辛，自非三言兩語所可罄事。座落苗栗二平山的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樓，原由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中大先輩校友徐柏園以及李國鼎陳慶瑜諸先生等，募集了二百三十萬元款項興建。但是到研究所大樓完成，實際造價却已高達三百二十萬元。其中不敷之數，即係由研究所多方撙節勻支貼補。

因此研究所的經費，在一開始的時候，就感到相當的困難。何況苗栗二平山僻處山陬，對外交通祇有鐵路和公路的山線可以通達，遂而使師資的延攬頗感不便。專任教授無法在他校兼課，多半會影響生活。兼任教授則每上一次課，就要坐往返四個小時以上的火車，凡此種種，都曾形成我難以解決的困擾問題。

### 中大復校喜氣洋溢

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旦成立，包括我自己在內，所有的中大校友都雅不欲引為已足。校友們莫不希望中大益勵前修，繼往開來，再接再厲恢復大學部。因此，從五十一年起到五十六年止，我和校友們都在為這一個重大課題殫智竭慮，策劃奔走。其間由於既有的五甲校址，受到地形的限制

，無從擴充，乃使海內外學人眾謀僉同，中樞並有所決策：中大必需北遷，謀求解決師資和校址的雙重問題。

可是，這一個決策又引起了苗栗地方當局的敏感，當民國五十五年下半年度，教育部指示編列遷校概算時，半生以「誠樸」自勉如我者，居然也蒙受了不白之冤，無謂攻訐。苗栗縣議會在五十六年元月十四日來函促在苗栗成立大學部。我們尚未及作覆，三日後突又通過臨時動議，對中大遷校一事有所指責，謂我「竟堅持一己之偏見」，認為我「實非主持教育之適當人選」。於是函請教育部「另遴派所長」。兩日後更致函財政部、審計部、主計處，請剔除中大遷校預算。然後再散佈文字，不惜對我展開人身攻擊，掀起了一場風波。朋輩、校友、同事、同學們都憤慨不平的說：

「苗栗部份地方人士，怎可干涉中央機關的人事和預算？還要散佈文字，毀損戴所長的名譽？他們這樣做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啊！」

但是我的回答卻很簡單，我說我不懂政治，也沒學過法律。我是個學科學的，科學的精神在於求真。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不能真」。何況我一向抱定主張：「是非審之於己，毀譽聽之於人」，真象必將大白，何必多費週章呢？不過，倘若有誰肆意破壞我的名譽，我也得保留法律上的控訴之權。

在我直率求真的一生之中，這或將是絕無僅有的一場風波。我當時處之淡然，及今回想，苗栗地方人士，愛護桑梓，重視國立中央大學，希

望中大設在苗栗，這也是人情之常，情有可原的。至於措施之不當，自當另作別論。幸好，隔不久報章輿論便有了公正的批評，中央日報地方漫談指出我主張遷校是站在辦學的立場，地方人士則站在地方上的立場。因此，「雖然見解不同而有衝突，自應向教育部陳述理由，力爭在苗栗復校，應本正常程序進行，不要感情用事。節外生枝，不是正當的途徑。」聯合報也說：「中大要走，苗栗人士要挽留，但沒聽說苗栗地方人士那一位開誠佈公的與中大校方直接談過問題。只是些開會、陳情的官樣文章。」該報在列舉若干事實之後又謂：「……由這些地方觀察，所謂苗栗人士挽留中大，實際上是破壞中大遷校計劃。使中大想走而走不成，並不是誠意挽留中大留在苗栗。」

中大北遷前後，筆者仍與有關當局及中大校友多方協調，妥善籌劃，因此中大遷校後，即由財政部長李國鼎、經濟部長孫運璿、教育部長鍾皎光諸位先生之助，仍就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原址，設立了一所私立聯合工業專科學校，對於苗栗青年子弟的深造進修，大有裨益，由此事實可資證明，中大遷校，對苗栗與中大，正是兩全其美，兼籌並顧之舉。而中大係在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奉教育部命令，轉奉行政院令，准遷校桃園縣中壢市，並征購土地五十甲。中壢地方人士爲了表示歡迎，在這五十甲土地裏贈送了二十甲之多。

五十六年十二月二日，那真一是個喜氣洋溢，值得中大師生永遠紀念的日期，中壢新校址正

門前的大學路興工，由校友張其昀先生主持破土典禮，各地校友暨中壢士紳一百餘人到場致賀，自此展開了中大歷史的新頁。到了五十七年八月，中大奉准設立大學部物理學，及大氣物理學兩系，並且訂定名稱暫爲：「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」，院長一職由我承乏，地球物理研究所也包括在中大理學院之內。從此，決定中大的大學部設在中壢市，研究所仍舊暫時留在苗栗二平山。

中壢新校址的第一期工程，科學館大樓和秉文堂係於五十七年十二月七日正式興工的，破土禮由時任教育部長的閻振興先生主持，五十八年六月竣工。所以，中央大學的第五十四週年慶祝校慶大會，正好能在中壢市五權里的新建科學館裏舉行。同年八月中央大學大學部遷入新址，全校的初步遷建計劃設施，至此已告完成。在此以前，大學部最早設立的兩個系，還是借省立中壢中學的校舍上課。中大大學部的同學們，從寄人籬下，終於自己擁有渠渠華屋，高樓大廈了。

到了民國五十八年九月，奉教育部令准增設數學、化學工程、中國文學三個學系後，苗栗二平山上的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諸多不便，終於宣告解除。研究所師生們從苗栗二平山於同年暑期中，陸續搬遷至中壢五權里，其間所遭遇的艱苦與損失，決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幸而全校師生都能聚集於一處。六十年四月八日，中大理工館大樓行破土禮，由我在那塊處女地上挖下了第一鋤。

又是兩個月後，中大復校尤有所成，民國六十年六月六日，各界嘉賓和各地校友絡繹不絕，紛至沓來，衣冠鬢影，盛況一時，共有六百餘位

來賓校友齊集中壢市，同慶國立中央大學第五十六週年校慶。那一天，在中壢市五權里中大新址還有三項慶典，首先是中正圖書館落成典禮。中正圖書館係為紀念 總統蔣公一度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而命名，這是中大校友、師生有莫大的殊榮，此一典禮的主持人是張其昀先生。其次，則為桃園縣縣長許新枝，為校門前的大學路舉行通車典禮而剪綵。第三項盛典的主持人是我自己。我為中大復校後的第一屆運動大會，揭開了序幕。

早在苗栗創設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時期，我們先已購置了埃貝氏折射儀、X射線分析裝置，電子顯微鏡，地電阻測定儀等新穎名貴的儀器。及至在中壢市五權里設置大學部以後，先後設立的八個學系，每逢採購各項實驗儀器暨圖書用具時，我都竭盡所能，逐項加倍訂購，並且選擇其中最新穎最優良者為主體。我用這個最簡單，最迅捷的方針，果然能在極短促的時間之內，使我們中大同學的研究設備能夠迎頭趕上，規模尤可確立。因此教育界人士都推許中大復校為期雖然短暫，但却進步較速，差堪保持一流水準。這也是我無負全校師生囑望，聊以自慰的一項措施。

中大現有一個研究所和八個學系，在已可預見的未來，相信中大頻年申請增設的歷史學系、機械工程學系，和應用物理研究所亦可次第成立。那麼，不久以後，中大將會有兩個研究所和十個學系了。以此為基礎，欣欣向榮，循序漸進。我個人深信，絕對不難達到當年國立中央大學的雄壯規模，恢宏舊觀。——這便是在退休前夕，馨香祝禱的中大遠景光明，希望無窮。

### 建校委員一次盛會

也許，這就是我在退休以前的一次大規模社交活動了。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五日上午，中大邀請中壢市中大建校各促進委員來校參觀。當天，蒞臨中大的建校促進委員有該會主任委員、國大代表吳鴻森、前省議員、委員葉寒青、桃園縣新縣長、委員吳伯雄、前桃園縣議員林煥榮、黃標金、陳金昌、現任縣議員鍾維炫。前市長邱垂周、劉家興、新市長林煥夫、中壢市代會林木連、省議員許信良、張金城等卅餘人。我向這些位多方協助中大復校的有功地方人士，致詞歡迎，虔致謝忱，再引導嘉賓順序參觀校史室、圖書館、地震研究室、科學館、第二餐廳、男生寢室、女生宿舍及理工館後，方在育樂中心自助餐款待。我致謝詞後，這些位促進中大復校功臣發言摘要如次：

中大建校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大代表吳鴻森說：「戴院長在不到四年時間，把原來荒蕪台地，建設為一座文化城，並為地方帶來繁榮，我深深覺得我們當年爭取中大的努力，沒有白費。」繼由葉省議員寒青說：「今天承邀請參觀中大，看到有計劃的建築雄偉，規模宏大。回想當年，不禁令人感慨系之。當年苗栗地方人士不惜用種種手段，破壞中大遷建到中壢的計劃，甚至展開對戴院長的人身攻擊。院長寬宏大量，不予計較，却是我們聽了實在難過。幸虧院長有英明決斷，堅韌不拔的意志，方使中大遷校中壢，終底於成。」

「今天中大的成功，應該全部歸功於戴院長的領導與毅力，功不可沒，而且勢將永垂不朽。」戴院長充沛的精神和體力，實足以繼續領導國立中大，使中大更為發揚光大。萬一真有一天戴院長要光榮的退休，我們要為戴院長在校園裏豎立銅像。這不僅是留一永久的紀念。而且，還可以使全體青年學子，知所效法。」此語一出，全場熱烈鼓掌。

新任桃園縣長吳伯雄，也站了起來朗聲說道：「國立中央大學崇高的學術水準，為舉世所公認。中大的成就除有形的，無形的影響也更深遠。中大在中壢復校，不但提高了本地的學術水準，而且變化了地方的氣質！」

筆者對於各建校委員加諸於我的溢美之詞，頗感慚愧。中大復校有成，賴政府培植，校友熱心贊助，以及地方的諸多協助，還有自苗栗建所即已相隨的諸同仁，同心協力，黽勉從事，才克竟此事功。當然校友及中壢兩建校促進委員會對於筆者的關注與支援，也是筆者永銘五中，不會或忘的。

年前，政府為革新政治，起用青年才俊，推行退休制度，我為響應政府號召，即向台大辦理退休，並致函教育部蔣部長彥士先生，請辭中大理學院長，乃蒙當軸諸公繆愛，遲至今年五月方告批准，總算卸下了肩頭的這一副重担，還我自由之身。唯大陸未復，反攻建國人人有責，我當然不敢以衰朽自居，有生之年，仍當將致力於教學研究工作，希望能以一得之愚，對國家民族有所獻替。